

湯因明



1947



AA331.31

96

C

10

汤用彤选集

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选集丛书

汤一介 编选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三月五日

[按：本文为纪念我的父亲汤用彤先生诞生一百周年所写，原刊于《中国文化》1994年2月第9期。现在把这篇文章作为《代序》刊于《汤用彤选集》中，其中个别地方有所增改。]



汤用彤像

出版说明

为了系统地搜集和整理“五四”以来我国著名社会科学家的代表性著作,向广大读者介绍现代社会科学家在各个学术领域的成就,以推动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发展,特编辑出版《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选集丛书》。

本丛书的编选原则是:

一、列选的社会科学家,要求是我国现代社会科学各学科或专业的奠基者,开拓者,或是在学术理论研究方面有创见、成就卓著的知名人士。

二、丛书所选收的社会科学家的著作,要求尽可能体现其生平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系有代表性的著作。对其长篇论著一般只节选其中的主要篇章。

三、本丛书每位社会科学家各编选一集,每集约三十万字。

书中有对作者的生平、学术活动、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进行综合评价的述评或序。

汤用彤选集

汤一介 编选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河北省遵化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5印张 5插页 320千字

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201—02281—4/B·75

定 价：27.50 元

代 序

昌明国故,融会新知

汤一介

汤用彤(字锡予)先生生于一八九三年,今年是他诞生的一百周年,为了纪念他在学术和教育上的成就,北京大学出版社将出版《国故新知——汤用彤先生诞生百周年纪念文集》。季羨林先生为此纪念文集写了一篇序,在序中他论到近现代学术大师和前此的学术大师的不同,他说:

“俞曲园能镕铸今古,但是章太炎在镕铸今古之外,又能会通中西。……太炎先生以后,几位国学大师,比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胡适等,都是既能镕铸今古,又能会通中西的。他们有别于前一代大师的地方就在于此。……我认为,汤用彤(锡予)先生就属于这一些国学大师之列。这实际上是国内外学者之公言,决非我一个人之私言。在锡予先生身上,镕铸今古,会通中西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研读造诣很高,对汉译佛典以及僧传又都进行过深刻彻底的探讨,使用起来得心应手,如数家珍。又远涉重洋,赴美国哈佛大学研习梵文,攻读西方和印度哲学。再济之以个人天资与勤奋,他之所以成为国学大师,岂偶然哉!”

我认为,季先生提出近现代国学大师与他们以前的国学大师之不同的见解,非常有意义。从用彤先生一生的为学中可以得到证

明。用彤先生在大学教书多年,他既教中国哲学方面的课程,如“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又教西方哲学的课程,如“西洋哲学史”、“英国经验主义”(洛克、巴克莱、休莫)、“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实用主义”,还教授“印度哲学史”。他在南京时是支那内学院巴利文导师,在那里教授巴利文,并把巴利文佛经《念安般经》译成汉文。他出版的著作既有关于中国哲学的,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魏晋玄学论稿》、《往日杂稿》和《理学、佛学、玄学》、《校点高僧传》等;又有关于西方哲学的,例《叔本华的天才主义》,翻译了艾德温·华莱士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和尹吉的《希腊之宗教》等,还著有《印度哲学史略》。未出版的尚有《魏晋玄学讲义和提纲》、《短竹札记》(关于读佛教和道教著作的札记)、《哲学概论》(主要讲西方哲学)、《英国经验主义讲义》、《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讲义》和《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①等。可见用彤先生实是一位“熔铸今古,会通中西”的学者。在我国真正学贯中西的学者就不多,而学贯中西印的学者就更少了,而用彤先生就是这极少数学贯中西印的学者之一。

我认为,用彤先生为学有一宗旨:这就是“昌明国故,融会新知”,这也就是季先生所说的“熔铸今古,会通中西。”这一宗旨虽是一九二二年《学衡》杂志提出来的,但早在用彤先生一九一二年在清华学校读书时已有此类思想。据吴宓伯父日记载,在一九一五年他们谈到献身中国文化要从办杂志入手,“然后造成一是一之学说,发挥固有文化,沟通东西事理”。吴宓伯父一九一六年四月三日给吴芳吉先生的信中说:“宓自昨冬以来,联合知友,组织

^① 《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已于1994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一会，名曰天人学会。……会之大旨：除共事牺牲，益国益群外，则欲融合新旧，撷精立极，造成一种学说，以影响社会，改良群治。……会名之意，原因甚多。天者天理，人者人情。此四字实为古今学术、政教之本，亦吾人之方针倾向。”三十年代，吴宓伯父在其《空轩诗话》中，回忆说：“天人学会初发起人为黄华（叔巍、广东东莞），会名则汤用彤（锡予，湖北黄梅）所赐，会员前后共三十余人。方其创立伊始，理想甚高，情感甚真，志气甚盛。”

用彤先生于一九二二年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后，立即返国，并参加了《学衡》。他回国后的第一篇文章《评近人文化之研究》就是发表在《学衡》一九二二年第十二期上。在这篇文章中，用彤先生针对时弊指出了文化研究中的三种不良倾向：第一种是“菲薄国粹者”，他们“以国学事事可攻，须扫除一切，抹煞一切”，更有甚者，“不但为学术之破坏，且对于古人加以轻漫薄骂，若以仇死人为进道之因，谈学术必须尚意气也者”。第二种是“输入欧化者”，他们的缺点是对西方文化未作全面系统之研究，常以一得之见，以偏概全，“于哲理则膜拜杜威、尼采之流；于戏剧则拥戴易卜生，萧伯纳诸家”，似乎柏拉图尽是陈言，而莎士比亚已成绝响。用彤先生对这种割断历史、唯新是鹜的现象十分不满。第三种是“主张保守旧文化者”，他们胡乱比附，藉外族为护符，有的“以为欧美文运将终，科学破产”，有的甚至“间闻三数西人称美亚洲文化，或且集团体研究，不问其持论是否深得东方精神，研究者之旨意何在，遂欣然相告，谓欧美文化迅即败坏，亚洲文化将起而代之”。

用彤先生认为这三种人的共同缺点是“浅”与“隘”。“浅”就是“论不探原”，只看表面现象而不分析其源流。用彤先生举关于中国何以自然科学不发达的讨论为例；不少人认为由于中国“不

重实验,轻视应用,故无科学”。其实西方的科学发达并不全在实验和应用,恰恰相反“欧西科学远出希腊,其动机实在理论之兴趣,……如相对论虽出于理想,而可使全科学界震动。数学者,各科学之基础也,而其组织全出空理”。因此,科学发达首先要有创造性的思想和理论。中国科学不发达首先“由于数理、名学极为欠缺”。而不是由于“不重实验,轻视应用”。“隘”就是知识狭窄,以偏概全。例如有些人将叔本华与印度文化相比附。用彤先生指出叔本华“言意志不同于佛说私欲,其谈幻境则失吠檀多真义,苦行则非佛陀之真谛,印度人厌世,源于无常之恐惧,叔本华悲观,乃意志之无厌”。如果不是受制于“隘”,则会看到“每有同一学理,因立说轻重主旨不侔,而其意义即迥殊,不可强同之也”。由于“浅”、“隘”,就会“是非颠倒”,“真理埋没”,对内则“旧学毁弃”,对外亦只能“取其一偏,失其大体”。结果造成“在言者固以一己主张而有去取,在听者依一面之辞而不免盲从”,以致文化之研究不能不流于固陋。因此,用彤先生强调指出:“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讨论”,必须对于中外文化之材料“广搜精术”、“精考事实,平情立言”才能达到探求真理的目的。

如何探求真理?用彤先生认为,必须从继承和发展本民族文化与吸收和融合其他民族文化中求得,这就是要“昌明国故,融会新知”之原因。

为什么要“昌明国故”?用彤先生和当时许多研究者看法不同,不是从狭隘的民族自尊自大出发,单纯强调中国文化如何辉煌灿烂,因为这里并无客观标准,任何民族都可以对自己的文化作出如此评价;也不是片面地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价值评判,认定优劣,随意取舍;而是科学地分析了历史的延续性,断定一切新事物都不可以凭空产生,无源无流,兀然自现。他认为研究文化

学术，必不能忽略“其义之所本及其变迁之迹”。因为“历史变迁，常具持续性，文化学术虽异代不同，然其因革推移，悉由渐进”，必“取汲于前人之学说，渐靡而然，固非骤溃而至”。“昌明国故”就是要在这种推移渐进的过程中，找出延续而被吸收的优秀部分。所说优秀并非个人爱好的主观评价，而是历史的择取。用彤先生举例说，魏晋玄学似乎拔地而起，与汉代学术截然不同；但魏晋教化，实导源东汉。“王弼为玄宗之始，然其主义实取代儒学阴阳家之精神，并杂以校练名理之学说，探求汉学蕴摄之原理，扩清其虚妄，而折衷于老氏。于是汉代经学衰而魏晋玄学起”。（见《言意之辨》）显然，魏晋玄学与东汉学术有了根本的不同。汉代虽已有人谈玄，如扬雄著《太玄赋》，但其内容“仍不免天人感应之义，由物象之盛衰明人事之隆污。稽察自然之理，符之于政治法度。其所游心，未超于象数。其所研求，常在乎吉凶”。（见《魏晋玄学流别略论》）而魏晋玄学则大不相同，“已不复拘拘于宇宙运行之外用，进而论天地万物之本体。汉代寓天道于物理，魏晋黜天道以究本体，以寡御众，而归于玄极（王弼：《易略例·明象章》）；忘象得意，而游于物外（《易略例·明象章》）。于是，脱离汉代宇宙之论（Cosmology or Cosmogony）而留连于存存本本之真（Ontology or Theory of Being）。”（同上）总之，“汉代偏重天地运行之物理，魏晋贵谈有无之玄致”。（同上）汉学所探究，“不过谈宇宙之构造，推万物之孕成；及至魏晋乃常能弃物理之寻求，进行为本体之体会。舍物象，超时空，而究天地万物之真际。以万有为末，以虚无为本”。（同上）

为什么于汉魏之际学术文化有如此重大的转变？用彤先生认为，此盖乃有新眼光、新方法之出现也，他说：“研究时代学术之不同，虽当注意其变迁之迹，而尤应识其所以变迁之理由”。他

认为,变迁的一般理由有二:“一则受之时风,二则谓其治学之眼光、之方法”,而后者更为重要。因为“新学术之兴起,虽因于时风环境,然无新眼光、新方法,则亦只有支离片段之言论,而不能有组织完备之新学。故学术新时代之托始、恒依赖新方法之发现”。(见《言意之辨》)文化发展的重大转折,必然由于新眼光、新方法之形成,这种新眼光、新方法,有的由于本身文化发展和时风环境孕育而生,有的则是受到外来文化之影响。获得新眼光、新方法就是“融化新知”。在用彤先生看来,“融化新知”从来就是推动文化学术发展之关键。他进一步举魏晋玄学之取代东汉学术为例,指出玄学“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Cosmology)而进探本体存在(Ontology)。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粗迹而专期神理之妙用”。(见《言意之辨》)为什么学术重点会从“有言有名”、“可以说道”的“具体之迹象”突变而为“无名绝言而意会”的“抽象本体”呢?用彤先生认为其根本原因就是“言意之辨”这种新眼光、新方法得到普遍推广。“而使之为一一切论理之准量”。言和意的问题远在庄子的时代就已提出,而何以到魏晋才被特别重视起来?用彤先生指出,这是由于当时时代环境对于“识鉴”,亦即品评人物的需求。品评人物不能依靠可见之外形,“形貌取人,必失于皮相”。因此,“圣人识鉴要在瞻外形而得其神理,视之而会于无形,听之而闻于无声”。言不尽意,得意忘言。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与庄子时代已不相同,而以言和意之间距离引发出“迹象”与“本体”的区分。正是这种有无限潜力的新眼光、新方法成就了整个魏晋玄学体系。汉代学术始终未能舍弃“天人灾异,通经致用”等“有形之粗迹”,就因为“尚未发现此新眼光、新方法而普通用之”。总之,学术变迁之迹,虽然可以诱因于时代环境之变化,但所谓“时风”往往不能直接促成学

术本身的突变,而必须通过新眼光、新方法的形成。因此,从发现并获得新眼光、新方法为目的“融化新知”就成为推动文化发展,亦即“昌明国故”的契机和必要条件。

在“融化新知”的过程中,外来文化的影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关于原有文化如何“融化”外来文化这种“新知”,用彤先生也有独到见解。他反对当时盛行的“演化说”,即认为“人类思想和其他文化上的事件一样,自有其独立发展演进……完全和外来文化思想无关”;他也不同意另一些人所主张的“播化说”,即“认为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思想都是自外边输入来的”,或以为“外方思想总可以完全改变本来的特性与方向。”用彤先生认为“演化说”和“播化说”都是片面的。他强调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接触,其结果必然是双方都发生变化。“不但本有文化发生变化,就是外来文化也发生变化”。因为外来文化要对本地文化产生影响,就必须找到某些与本地文化相合的地方,就必须为适应本地文化而有所改变。“譬如说中国葡萄是西域移植来的,但是中国的葡萄究竟不是西域的葡萄,棉花是印度移植来的,但是中国的棉花究竟不是印度的棉花。因为它们适合地方,乃能生在中国,也因为它们适应新环境,它们也就变成中国的了”。同理,外来思想要为本地所接受而能生存就必须有所改变以适合本国的文化环境。因此,“本地文化虽然受外边影响而可改变,但是外来思想也须改变,和本地适应。”例如,印度佛教传到中国,经过了很大改变,成了中国佛教。在这个过程中,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化相合或相近的能得到发展,不合或不相近的则往往昙花一现,不能长久。“天台、华严二宗是中国自己的创造,故势力较大;法相宗是印度道地货色,虽然有伟大的玄奘法师在上,也不能流行很长久”。用彤先生根据印度传入中国的历史指出:外来思想的输

入往往要经历三个阶段：其一，“因为看见表面的相同而调和”。这里所讲的“调和”并非折衷，而是一种“认同”，即两种不同传统文化思想的“某些相同或相合”。其二，“因为看见不同而冲突”。外来思想的传入逐渐深入，社会已对这个外来分子看作一严重事件。只有经历这一因看到不同，而冲突、而排斥、而改造的过程“外来文化才能在另一文化中发生深厚的根据，才能长久发生作用”。其三，“因再发现真实的相合而调和”。在这一阶段内，“外来文化思想已被吸收，加入本有文化血脉之中”。外来文化已被同化，例如佛教已经失却某些本来面目而成为中国化的佛教，而中国文化也因汲取了佛教文化而成为与过去不同的新的中国文化。两种不同传统文化接触时所发生的这种双向选择和改变就是“融化新知”的必经过程。（本段以上引文均见于《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

从用彤先生一生之为学可见他都是在探索和实践其“昌明国故，融会新知”之宗旨。一个学术大师在学术上取得成就，除要有一贯为学的宗旨外，还必须对学术研究有认真、严谨的态度。用彤先生研究学问之认真与严谨向为学术界称道。钱穆伯父说：“锡予为学，必重全体系、全组织，一丝不苟”，（见《忆锡予》）贺麟伯父说：用彤先生“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材料的丰富，方法的谨严，考证方面的新发现，义理方面的新解释均胜过前人。”（见《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季羨林先生说：《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规模之恢弘，结构之谨严，材料之丰富，考证之精确，问题提出之深刻，剖析解释之周密，在在可以中外学者们之楷模。”（见《汤用彤先生诞生百周年纪念文集》之序）我和我父亲在一起生活过三十多年深知他为学之艰苦、认真和严肃，下面我想谈谈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我父亲很少告诉我应该如何作学问，我记得只有一次，我在重庆南开中学读高中时，因对文史有点兴趣，写了一点有关中国哲学的文章寄给他看，我父亲当时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他给我回了一封信大意是说：作学问如登山，要努力往上攀登，爬得越高才能看得越远，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方面。我当时只有十几岁，对此体会不深。除此之外，在如何为学方面，似乎他再没有对我进行什么“言教”。用彤先生在为学方面给我影响和教育最深的是他的“身教”。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我曾听过他两门课：《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从二十年代起他教这两门课已经不知道多少次了，但他每次上课前都要认真准备，重新写一讲课提纲，把一些有关的英文著作拿出来再看看。当时他担任北大的行政领导工作，白天要坐在办公室，只能晚上备课到深夜。他讲课，对于那些哲学家（如洛克、笛卡尔等）全是根据原书；他讲的内容，几乎每句话都可以在原著中找到根据。用彤先生也要求学生认真读这些哲学家的英文原著，并常常把原著中的疑难处一句一句解释给我们听，这对我们帮助很大。用彤先生这种扎实的学风，对同学们有很大影响，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四十年代北大哲学系的华业的学生作学问都比较认真，基本功比较扎实。

从一九五六年秋起，我回到北京大学作为我父亲的助手，帮助他撰写一些短文和整理他的旧稿。由于解放以来“左”的思潮的影响，今天回想起来，我并没有对我父亲的学术研究工作有多大帮助，相反帮了一些倒忙。但在作用彤先生助手的几年中，我确实感到作学问的艰苦。一九五四年因批判胡适的运动，我父亲患脑溢血，一直在病中，可是只要身体许可，他就看书作研究。我记得他为写《论中国佛教无“十宗”》和《中国佛教宗派问题补

论》，这两篇文章加起来不过三、四万字，但他几乎花了两三年时间翻阅《大正藏》、《续藏经》、《大日本佛教全书》，总计起来大约上千卷了。用彤先生在论证他的观点时不仅利用对他有利的材料，而且能对那些与他观点不相合的材料一一作出合理的分析和解释。相比较说，现在我们也有些“学者”写文章，常常只抓住一两条对他的观点有利的材料，大加发挥，而对与他观点相左的大量材料都视而不见，不是全面地掌握和分析材料，这种情况不仅不能推动学术研究的前进，而且大大地败坏了学风。用彤先生花那么大力气研究中国佛教宗派问题的原因之一，据我了解，就是要纠正长期以来某些日本学者的不正确观点，恢复历史本来面目。这使我想起三十年代的事，本世纪日本学者对中国佛教的研究十分重视，而且取得了很大成绩。相比之下，中国学者的研究不算丰富。日本学者对中国佛教的研究虽有很大成绩，但错误也不少。于是我父亲就选择了当时日本最有影响的佛教研究大师常盘大定、冢本善隆、足立喜六、矢吹庆辉、高井观海等，对他们的著作进行评论，指出他们的错误，写成《大林书评》（见《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我想，如果不是广泛、认真、仔细的读书，深入细致的研究史料，不具有广博中外历史知识，大概很难一一指出日本这些权威学者的错误的。

我想再举一个例子说明用彤先生严谨的学风。他写了一篇短文《何谓“俗讲”》，也就一千多字，邓广铭先生说：“几十年来，研究‘俗讲’，发表了那么多文章，对何谓‘俗讲’都不大明确，但汤先生这篇文章，可以说把问题说清楚了。”类似的意见，唐史专家汪篯在生前也对我说过。我父亲在这篇短文最后有一段话：“又目前学者以押座文为‘俗讲’的组成部分，据八相押座文言：‘西方还有白银台，四众听说心聪开’。四众当包括‘和尚’，‘尼

姑”等。那么或是圆珍所言有误，或是僧讲亦有押座文，当继续研究”。我父亲并不是专门研究“俗讲”的专家，根据材料能解决的他就说出自己的意见，还没有完全解决的，他就实事求是地说“当继续研究”。我父亲为什么能对“俗讲”给以较为合理的有根据的说明呢？这又和他读书十分认真、仔细、治学严谨分不开的。在他阅读《大正藏》过程中，他发现了日本沙门圆珍在《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记》中，有一段关于唐代“俗讲”的记载，从而才能对“俗讲”作出合理的说明。这条材料为什么中外学者过去都没有引用过呢？可见，我父亲读书之认真、仔细、广泛在学者中是非常突出的。

成为一真正的国学大师，不仅在学问上应为人师表，我认为，在为人上也应堪称楷模。学问之养成与人格之养成往往相辅相成。用彤先生为学之宗旨和他为人之准则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我们从他的著作中可以体会到，他不仅对中外古来之先贤大德的学问抱以同情的理解，而且希望通过他的著作使古来圣贤之人格光辉于世。

用彤先生虽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八年在清华学校受美式之教育，后又留学美国四年，但正如钱穆伯父所说：用彤先生“绝不有少许留学生西方气味”，“亦不留丝毫守旧之士大夫积习”，“俨然一纯儒之典型”，有“柳下惠圣之和”之风。我想就我所知也谈谈我父亲之为人。

我父亲汤用彤先生生前最喜欢用他那湖北乡音吟诵《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和庾信的《哀江南赋》。

我记得我的祖母曾经对我说，我祖父汤霖就最喜欢吟诵《哀江南》和《哀江南赋》。我祖父是光绪十五年的进士，于光绪十八年在甘肃渭源作知县。我父亲就生在渭源。据我祖母说，我父亲